

论法国农民在现代化进程中的进步性与保守性

刘书增

(南开大学 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 天津市 300071)

摘要:农民问题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中的关键问题。法国农民在现代化进程中既表现出经济改革上的进步性和保守性,也表现出政治革命中的革命性和保守性。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法国农民在物质生产能力和商品交换能力提高的基础上,生产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逐渐向现代人转变。这对于我国正在进行的农业现代化建设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现代化;法国农民;法国大革命

中图分类号:K5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677(2007)02-0175-05

现代化是指传统的以农业为基础的社会向以工业为基础的现代社会的转变过程。在传统的农业社会中,农民是最基本的社会群体,因此,农民问题也就成为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时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在建设现代社会的过程中,任何经济变革和政治革命,如果没有农民群体的参与和支持,都不可能取得成功。所以,农民是进步的还是保守的,对现代化是抵制的还是支持的,成为现代化能否实现的关键。法国素有“欧洲的中国”之称,研究法国现代化进程中农民的转变,对于我国目前党和政府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笔者认为,在法国现代化的进程中,法国农民在经济改革和政治革命中既表现出革命的进步性,也暴露出法国农民的保守性。在19世纪下半叶法国社会总体环境的进步与发展过程中,法国的农民也有了转变,逐渐成为现代法国农民,对法国的现代化进程表现出积极的推动作用。

一、法国农民在经济改革中的进步性与保守性

传统农业社会的经济改革主要表现在农业生产制度领域和技术领域的变革上。农业生产制度性的变革主要是废除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度,建立资本主义的土地所有制度,确立私有产权。农业生产

技术的变革主要包括新的土地经营方式的采用,改变旧的轮作方法,新的农作物品种的引进,农作物品种的改良以及新式农具的使用等等。农民在经济改革方面的进步性主要表现在用革命的行动迫使政府取消封建地租和封建特权,废除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度,建立资本主义的土地所有制度。法国农民在经济改革中的保守性主要表现在对通过圈地建立资本主义农场的抵制和对传统的公共地役制及旧的生产方式的坚持上。

16世纪以后,法国土地所有制演化的总趋势是农民逐渐取得了对土地的所有权,17—18世纪,形成了农民小土地所有者的有力阶层。卢切斯基证实,农民在法国北部占有三分之一的土地,而在法国中部与南部农民拥有的小块土地约占全部土地的一半,许多地方甚至占一半以上^{[1]77}。但是土地的最高所有权仍然属于领主,农民耕种的土地是作为世袭租佃地保有的,因此要交纳贡租和地租。还要向教会缴纳什一税,受到诸多条件的限制。为了废除封建权利,获得独立的土地所有权,在大革命前夕,法国农民在三级会议选举时提出了自己的陈情书,一致要求废除封建捐税和什一税,取消领主特权,要求特权等级同他们一样纳税,获得更多的土地或租用更多的土地。三级会议选举后,农民就等待着政府对他们的要求进行答复。当三级会议召开后,他们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使他们的希

* 收稿日期:2006-05-25

作者简介:刘书增(1970-),男,山东冠县人,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邯郸学院历史系,讲师,主要研究世界近现代史、欧美经济史。

望变成了一触即发的愤怒。当攻陷巴士底狱的消息传来时,这愤怒就变成了遍及各省乡村的骚乱和暴乱,一场农民革命开始了!“在诺曼底西部、艾诺和上阿尔卑斯,农民袭击贵族的乡墅和修道院,焚毁文契档案,强行取消领主特权。在佛朗什—孔代和马孔内,农民烧毁和洗劫贵族乡墅。”^{[2]113} 农民“涌向领主的城堡,用威胁手段让他们交出那些登记着令人痛恨的封建权利的古老证书,以及那些很久以前使征收捐税合法化的契约,并把这些文件在乡村的广场上付之一炬。有的领主拒绝交出文件,农民们便焚毁城堡,把城堡的主人绞死。比较常见的做法是让当地的公证人出面,以证明封建权利是按照规定的程序放弃的”^{[3]106}。法国农民用暴力把压榨、剥削自己的封建权力和封建制度打翻在地,摧毁了封建等级制度的经济基础。正是在农民起义的压力下,在著名的8月4日之夜,聚集于国民制宪会议上的自由派贵族和僧侣们举手通过了关于废除什一税、废除封建特权等级的免税特权和其他封建权利和封建义务的决议,使他们获得了独立的土地所有权。为了获得农民的支持来保卫革命的成果,雅各宾派在1793年通过了彻底的土地法令,把土地分成小块卖给农民,地价分十年付清。法国农民终于用自己的行动推翻了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和封建制度,体现出法国农民的进步性。

法国的农民由于处境非常困难,他们没有土地或只有极少土地,习惯于日复一日地耕种小块土地,他们受的教育太少不能适应新的耕作法,太穷无法进行亟需相当资金的土壤改良,享受不到改革的好处,因而对改革没有丝毫兴趣。相反,对改革什么都害怕。他们一致组织起来到处组成突击队,反对由孤立的产业主试行的改革措施,反对圈地法令,到处拆除围墙篱笆,以表达不满的集体意识。如1787年有人劝阿尔萨斯一个土地所有者进行农业革新,以求获得更高的产量时,他说:“篱笆圈地毫无意义,因为总会被人拆除。”^{[4]44}

按照传统的公共地役制的规定,有地农民必须依照公社惯例实行轮作,而公社内的每个农民都可以在公社公有土地上,在为私人所有的收割后的田地上,以及第一次割草后的草场上拾捡落穗,割取麦秸,放牧畜群。这种规定使大量少地、无地的农民凭借公社的公有土地和公共放牧等集体权利,可以勉强度日。但无疑是对有地农民土地权利的一种限制,使得有地农民不能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经营土地,限制了农民个体经济的发展,不利于资本主义的分化。所以,要实现农业技术的革新,必须

废除残余的公社权利,废除公共放牧权。但是,法国的农民,特别是那些无地或少地的农民,担心取消了集体放牧权会使他们落入无产者的队伍,使他们的处境更加艰难,因此顽固地坚持这种公共地役制和旧的生产方式,阻碍了农业的生产革新。在大革命初期,许多受到圈地法令触动的地区(如普罗旺斯),农民们在农业混乱过程中企图以武力恢复集体地役权。许多堂区的议会,然后是农村的市镇当局,乡村的人民协会等等,在他们的备忘录中提出了这种倒退的要求。由于农民的反对,公共放牧权在敞型地区长期存在。1989年,众议院彻底取消了它,次年,面对农民的反抗意识,不得不重新准许实行它。在洛林、香槟、皮卡第、佛朗什—孔泰,以及其他一些地区,许多村镇在法律的准许下,保留了耕地上或草场上的公共放牧权。英国的历史学家西伯姆习惯于从故纸堆中寻找长期来在其祖国土地上被抹却的共同放牧权,但在1885年他十分惊奇地看到现实生活中畜群在博斯的留茬地上游荡^{[4]235-236}。强制轮作的耕作方式也长期存在,一直到19世纪下半叶,不止一个农村,仍然将他们的初翻地弃置搁荒,任牧人与猎户光顾。这种制度甚至一直延续至今。

从上可见,农民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过程中,既扮演了革命者的角色,但有时又充当了经济改革的绊脚石。正是由于法国农业和农民在经济上的这种保守性,使法国的经济发展长期落后于英国,后来又被美国和德国赶超。

二、法国农民在政治革命中的进步性与保守性

在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过程中,政治革命的主要任务是推翻旧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并使之向民主化方向演进。法国农民在这个过程中,积极地参加革命,充当了革命的主力军,对于推翻封建制度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同时也表现出他们一定的保守性。

在大革命开始的时候,农民便向三级会议提交了自己的请愿书,表达了农民要求废除封建制度,取消封建权力的愿望。当革命爆发后,农民更是在各地组织了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这种强大的农民运动动摇了封建专制统治的基础,巩固了巴黎人民在7月14日取得的革命胜利,从而为大资产阶级在全国范围内取得政权创造了条件。当革命面临着国内王党的叛乱,国外面临着欧洲列强的干预的危险的时候,成千上万的农民怀着对保卫自己新

得到的土地面受敌人侵犯的信念而投身军队、奋战沙场,保卫了革命的成果。拿破仑帝国建立之后,通过了著名的《民法典》,把农民获得的土地以法令的形式固定下来,极大地鼓舞了法国农民的革命积极性,他们踊跃参加拿破仑的军队,抵抗外国干涉军,在战争中,英勇善战,保证了法国军队打败外国干涉军。可见,没有法国农民的积极参与就没有法国革命的胜利。大部分法国农民在法国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关键时刻充当了革命性的角色。

在农业社会中,土地是农民生存的唯一依靠,因此,农民的一切善恶取舍都以土地的得失与否作为判断标准。当大革命使农民获得了土地以后,他们便想方设法保卫他们已获得的土地。1793年,在西部各省,特别是旺代、普瓦图等地区,农民对政府征召30万大军不满,担心这次征兵会使他们离乡背井去国外打仗,丧失他们已经获得的土地,他们从自身的经济利益出发,与反对革命的贵族和教士一起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旷日持久的反革命叛乱,给革命事业造成了很大的被动。在大革命以后的几十年里,法国政局动荡不安,封建保守势力和资产阶级革命力量的斗争一直在继续,共和制和君主制的较量也一直在进行。但是法国的农民不理解它,对于在巴黎和其他城市发生的政治事件很少关心,只是偶尔被卷入其中。在农民看来,只要他们拥有土地能够维持温饱,君主与共和都无关紧要。当1848年成年男子的普选权第一次在法国实现的时候,法国农民还游离于现代政治之外,不仅对选举权利没有基本的理解,而且连自己的选举准则和选举意向都不明确。由于受封闭隔绝的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的限制,以及由于千百年来卑微的社会地位和传统的文化教养所造成的委琐、胆怯的人格特征的影响,他们只希望有一个高高在上的权威给他们以保护,所以,当头上带有拿破仑光环的路易·波拿巴许诺给他们以秩序和繁荣的时候,他们毫不犹豫地把手票投给了路易·波拿巴,用手中三分之二以上的选票扼杀了无数进步人士奋斗多年的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正如马克思所分析的,“波拿巴王朝所代表的不是革命的农民,而是保守的农民,不是力求摆脱小块土地所决定的社会生存条件的农民,而是想巩固这些条件和这种小块土地的农民,不是力求联合城市并以自己的力量去推翻旧制度的农民,而是愚蠢地拘守着个旧制度并期待帝国的幽灵来拯救他们和他们的小块土地并赐给他们以特权的农村居民。”^{[5]218}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在从传统农业社会

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历史进程中,农民由其生产方式、经济利益和社会历史地位所决定,“极端保守的农民形象和作为革命力量的较为现代化的农民形象是同时并存的”^{[6]286}。因此,要成功地实现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传统农民向现代农民的转变是至关重要的。

三、法国农民向现代人的转变

法国农民向现代人的转变首先表现在广大农民进行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能力的普遍提高上,极大地改变了过去那种自给自足的生产生活方式。法国大革命废除了土地贵族的封建权力,消除了农民与市场间的障碍,使得农民占有的土地有所增加,为农民进入市场扫清了道路。但是,由于大革命期间以及拿破仑时代的战乱,使得“大革命对农民经济的改造很少,直到19世纪中叶,土地的结构、生产技术和生产率都没有明显的变化”^{[7]117}。不过,法国农民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使生产率有所提高,为19世纪下半叶的显著变化创造了条件。法国经济学家弗朗索瓦·卡隆指出,如果比较历年的产量,收获量的增长趋势便很显然,如1826年每公顷小麦12.18公担,1835年为13.43公担,而在这一时期,布律纳引用的巴黎盆地每公顷正常产量为16.7公担^{[8]105}。这说明法国的农业生产率和法国农民的物质生产能力有了提高,农民的产品超过其个人生活消费和在生产资金的生产结余越来越多,在日益增强的市场需求的刺激下,走进市场的机会越来越大。许多书籍记载,19世纪中叶以后“农民普遍地越来越多地卷入为市场而生产”^{[9]152}。农民与市场发生了广泛而密切的联系,“农妇们不再是每年只有五六次跑市场了,而是开始每周一次去市场上出卖家禽或牛奶制品。新的现金收入逐渐使她们成为市场上的消费者,购买曾经是家里制作的或者根本不曾有过的奢侈品:鞋子、围巾、雨伞、衬衣、咸鱼和鲜肉”^{[7]407},许多中小农在附近市场出卖为数有限、但日益增多的农产品。农民频繁的、普遍的、日益增多的商品交换活动,改变了生产者与市场不发生直接联系的自然经济的市场流通方式和封闭的自给自足的经济体系,农民本身的社会生活和思想面貌也在发生深刻的变化。

随着物质生产能力的加强和商品交换能力的提高,法国农民独立的精神力量得到了普遍发展。19世纪下半叶,农民闭塞的僵滞的社会关系发生了不可逆转的松动。由于工商业的发展,城市生活的刺激,许多土地所有者离开农村定居城市,这就

使土地所有者对佃农、雇工的个人控制减少,租佃人只需按约缴纳租金就可以了,从而在土地承租人与佃农或雇工之间,土地所有者与佃农和雇工之间发展起一种纯粹现代的“现金交换”关系,传统的人身依附、人身控制不再存在。而工业化的进行和移民运动的发展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乡村人口离开乡村社会前往城市。从19世纪50年代以后,法国农村每年失去12.5万人(据莱维-勒博耶估计为10万人),在1861年和1911年间,法国农村人口下降380万人,根据法国统计局的数字,在这个时间内农村大批外流人口总数达570万人,而根据莱维-勒博耶估计为490万人^{[8]108}。移民运动减少了农村的人口压力,这是展开农业革命的必要先决条件。频繁的商品交换的经济实践,使农民懂得了其自身劳动的价值,也懂得了实现其劳动价值的途径,促使他们把对传统社会的个人依附意识转变为对非个人市场力量的自觉服从,使农民愈益成为参与市场的独立的商品生产者,从而成为介入市场经济的现代农民。

经济交往的增多也促进了社会流动,法国农民不再局限于狭窄的地域范围,他们的社会活动范围大大扩大,形成了新的经济联系和新的社会关系网络。位于普瓦迪埃至南特铁路线上的马齐雷乡村小车站,在铁路建成后的第一年仅售出4500张火车票,几年以后,每逢星期三在离这个小车站15公里远的小城镇有集市的时候和每逢一个月的第一个星期四在附近的一个较大的城市里有大集市的时候,火车就人满为患,有时不得不增开临时列车。1885年,这个火车站售出13046张火车票,1890年有19089名旅客乘车,1900年增至33724人次,1909年达42360人次^{[10]133}。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农民与市场之间的联系增多与扩大。法国农村社会交往方式也发生了变化。以往,法国农村的大部分地区都有夜间聊天的习惯,或一周几次,或每天晚上,几户乡邻或朋友,或共守一烛灯光,或同围一堆薪火,妇女们做女红,男人们侃大山,古老的口头文化在这里传播,传统的风俗习惯在这里继续,无论是其形式还是内容,夜间聊天都在发挥着维持传统社会的消极的社会作用。随着农民的经济重心转向市场,社会交往的中心也发生了变化,19世纪70、80年代,夜间聊天的习惯在各地普遍减少,取而代之的是市场越来越成为农村社会经济和社会活动的中心,农民通过市场与外界发生联系,他们经常来这里买卖商品,交换信息,听取新闻,议论时事。法国农民就是在日益增多的经济活

动和社会交往中实现了自身的解放。

法国农民向现代人转变的另一表现是接受教育水平的提高。1833年,法国议会通过了教育法案,规定学校必须教授阅读、写作、计算的基本技能,必须教授法语以增强民族意识,同时进行道德教育,满足社会和人们精神生活的需要,此后,政府不断增加教育投资,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入伍新兵中识字人数的比例由1829年的14.3%增加到1855年的31.9%,1860年的34.8%,1865年的41%,1868年的50%和1875年的62%^{[7]308}。19世纪年代初,法国政府取消了公立学校的学费,并规定每个有20名以上学龄儿童的村庄必须开办一所公立学校,以实现初级教育的普及。国家公共教育的经费预算由1878年的53640714法郎激增到1885年133671671法郎,增长了一倍还多。农村小学如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来。农民及其子女接受教育的水平普遍提高。1867年全国平均儿童就学率为69.1%,1876年达到73.6%^{[10]139}。19世纪60年代起,一些廉价的报纸杂志和书籍进入农村,读书看报的人越来越多。学校的教育和报纸杂志上的宣传影响着农民的精神世界,使农民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变化,导致他们开始关心政治生活,参与到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去。

法国农民在政治上向现代社会转变突出表现在农民对待选举的认识逐渐深化上。当1848年成年男子的普选权在法国实现的时候,法国农民对于选举没有基本的理解,他们在投票的时候容易受到别人的影响和控制,对自己的选举原则和选举意向不明确。但是随着他们越来越多地卷入社会经济生活,随着他们的文化水平的提高,农民的参选意识和政治觉悟有了明显的提高。1870年代以后,农民在选举期间谈论政治,谈论共和派,谈论征税和农业贸易保护等问题,他们已经学会把自己的要求与投票选举结合起来。他们不再像普选刚刚实行的时候追随镇长投票,选举当地的贵族绅士或者王朝的继承者,而是选择能够代表自己利益的农村中产阶级、公证人、医生、教师等新的社会精英做自己的代言人。这表明农民的政治意识和政治觉悟正在提高,他们开始关心国家的制度、政策和法令,他们正在逐渐融入现代政治生活。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法国农民在物质生产能力和商品交换能力的提高的基础上,改变了过去那种自给自足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他们的社会交往能力逐渐提高,在国家加大教育投入的基础上,他们的科学文化素质有了提高,思想观念发生了深

刻变化,逐渐融入现代的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逐渐从传统农民向现代人转化。这对于我国农村的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四、几点思考

目前,我国正在经历由农业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过程中,由于我国的农业人口占全国人口的多数,因此,农业、农民和农村问题成为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问题。党和政府在农村的改革已经取得了良好的成果,我国的农业正在向现代农业转变,我国的农民也正走在向现代人转变的大道上。

我来自于农村,见证了党和政府的农业经济体制改革政策给农民带来的物质生产能力和商品交换能力的提高。生产工具由原来的用耕畜作动力到现在使用拖拉机、播种机、联合收割机,实现了耕、播、收、打的机械化,提高了农业的生产率,小麦由原来的亩产 200 多斤到现在的 600—800 斤,农民由主要满足自己食物需要而生产粮食作物到现在经营为市场而生产的棉花、水果、蔬菜等经济作物,农民越来越多地和市场联系在一起。我国决定从 2006 年 1 月 1 日起取消在我国实行了 2 000 多年的农业税,必将大大减轻农民的经济负担,增加农民的收入,从而加大对农业的投入,进一步提高农民的物质生产能力和商品交换能力的提高,使农民的生产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发生巨大的变化。

农民物质生产能力的提高保证了部分农民脱离农业劳动向第二和第三产业转移,从农村迁往城市,为农业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提供劳动力,同时也促使农民的生产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发生变化。如果说法国的马齐雷小火车站的变化反映了法国农民与市场联系的扩大,我国每年春节交通运输出现的民工潮和学生潮则反映了我国农民生产生活方式所发生的巨大变化:民工潮反映了农业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而他们每年回家过年不仅带回了资金加大对农业的投入,更重要的是带回城市里的现代生

活方式和思想观念;学生潮反映了农民在经济生活的冲击下越来越认识到教育的重要性,重视对子女的教育,农村的教育水平得到了提高。这些人群的迁移也带来了农民生活方式的变化,现在电视、电话、电脑已经逐渐地深入到农村,农民接触外界的渠道增多了,接收到的信息增多了,开阔了农民的视野,使他们开始关注国家的政策,关注国家的政治生活,逐渐融入现代政治生活中去。

因此,农业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关键的核心问题是农民向现代人的转变问题。而要实现农民向现代人的转变,必须提高农民的物质生产能力和商品交换能力,还要努力创造一个新的更广阔的就业领域,解决由于生产力提高而富余出来的农业劳动力,加大对农业、农民教育的投入,努力提高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改变农民的生产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使他们逐渐向现代人转变。在我国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我国的农业社会一定会早日实现向现代社会的转变,我国的农民也会早日过上小康生活!

参考文献:

- [1] 约瑟夫·库利舍尔. 欧洲近代经济史[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
- [2] 勒费弗尔. 法国大革命史[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
- [3] 索布尔. 法国大革命史[M]. 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 [4] Marc Bloch. French Rural History[M].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6.
- [5] 马克思. 路易·波拿巴德雾月十八日[M]//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八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 [6] 塞缪尔·亨廷顿. 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 北京:华夏出版社,1988.
- [7] Eugen Weber. Peasants into Frenchmen, modernization of Rural France 1870~1914 [M]. London, 1979.
- [8] 佛朗索瓦·卡隆. 现代法国经济史[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
- [9] Roger Price. A Social History of Nineteenth Century France [M]. London, 1987.
- [10] 许平. 法国农村社会转型研究[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责任编辑 张颖超

On the Progressive and Conservative Aspects of French Peasantry in the Process of Modernization

LIU Shu-zeng

(Research Center of Modern World History,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1, China)

Abstract: The issue of peasantry is the key question in the process of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traditional society into modern society. In the process of modernization, French peasantry has both the characteristic of being progressive and conservative in the economical reformation and political revolution. From the latter half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on the basis of the raise of the throughput of substance and ability of commodity exchange, the style of production and life of French peasantry have been transformed and gradually turned into modern people. This is of certain significance to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Key words: modernization; French peasantry; the French Revolution